

【解牛集】-刊於<信報>2012年3月20日

中國就業穩定比 GDP 增速更重要

鄭國漢

香港科大商學院院長及經濟學講座教授

全國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總理溫家寶所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備受關注。報告揭示今年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其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7.5%，不再「保八」，加快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成為各方矚目焦點。

把經濟增速降至 7.5%，制訂多一些措施刺激內需，包括發展服務業，方向很正確。因為中國政府的確需要在社會政策上，或者在最低工資政策上，使更多資源流入老百姓手中。中國的儲蓄規模很大，但其中除了老百姓持有的部分外，還有很大部份屬於企業，亦即並非私人儲蓄，老百姓不能動用。

另一方面，今次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推動科技創新，促進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這些政策筆者都十分認同。

粗曠型增長難以為繼

我過去在本欄也曾強調，中國應該重視經濟增長的質素，而不能只看增長速度。因為「粗放型」的增長，利用大量資源、土地、資金和人力進行生產，但很多產品附加價值不高。即使部分產品的價值相對高，所付出的環境成本及社會成本極為沉重。所以，中國如今面對的經濟環境，包括歐美經濟疲弱，外部需求萎縮，國內面臨發展失衡的壓力，以往高速增長恐怕難以為繼。

雖然美國經濟復蘇的步伐可望逐步在穩定下來後再有所提高，但歐洲經濟前景迄今仍不明朗。即便歐美經濟慢慢好轉，但中國過去以排山倒海的數量出口，持續多年至今，歐美市場相信也難再有力支撐中國出口繼續高速增長。

可以說，中國由出口帶動大部份增長的可能性已經無法持續。所以，中國經濟增速放慢實在難以避免。無論中央通過政策刺激，以內部需求驅動本地高速增長，替代以前出口推動的部份肯定會有成本。在金融危機後，中央投放四萬億元財政刺激，地方諸侯乘機增大投資配合，如今看到箇中的後果。雖然四萬億令增長率能夠成功「保八」，2009 年全年增長 8.7% 甚至比目標還高，但實際付出宏觀經

濟的代價，如通脹加劇、房地產泡沫、一些地方及央企債務出現困難，高鐵投資的輕率和罔顧風險等現象，即可見一斑。

就業穩定比生產總值增速更為重要

目前中國經濟把增速放慢，不再「保八」而把目標下調至 7.5%，強調增長的質素，提升國民的福利，增加勞動者報酬，是正確的決策。筆者認為，保持中國就業相對平穩的目標至為重要，因為嚴重失業影響社會安定。

換言之，就業平穩發展，避免勞動力市場急遽波動，較諸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對中國深化改革更為重要。兩者雖有正向關係，但相關性並不是一對一。如按照「奧肯定律」，美國實際 GDP 增長兩個百分點，失業率只下降一個百分點。很明顯，就業和經濟增長的比率不能劃上一個等號。經濟成長的速度並不等於就業增加的速度。

如今發展服務業，也肯定走對路。因為中國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其 GDP 或收入水平一直相對滯後。發展服務業，尤其對應中國有實際需求、但又未加以開發的部門，不僅有助經濟增長，而且可以成為持續長期發展的基礎，更能提供就業機會。所以，針對中國社會的需要，而又未能有效提供的服務部門，發展前途無可限量。

減慢增速有利推動經濟轉型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中提出積極調整收入分配關係，通過優化稅制，著力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加強內部消費對經濟成長的拉動。這種做法無疑針對當前發展的紕漏作出糾正。

一般而言，政府有積穀防飢的需要，但政府長期有巨大財政盈餘，意味抽走人民的購買力。雖然，政府可以通過投資的方式，把財政盈餘重投經濟實體，但做法帶有轉折性，何必呢？只有當人民有足夠的可動用收入，才能夠進行消費，才能支持贏利性的投資。

當然，政府的收入並非必須全數「派發」出去，或者以「轉移支付」的方式作全民式分配。但政府收入的有效運用，應該更多以「公共財」形式體現，如整治環境、投資公共設施、包括國防和國家安全的公共建設環節，也包括普及教育、公共衛生等，提升中國人力資源的質素。我相信，市場無法有效提供、或企業因「外部性」而不願意投資的資源投放，政府都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很明顯看到，當經濟過度好景，對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取得實質性進展構成一定障礙。因為經濟過份好景，需求極度旺盛，任何投資主體都容易做生意，並取得經營利潤，令潛在有前途和新的產業由於高租金和高薪酬加劇成本負擔面臨進入市場的困難。可以看到，過度好景的形勢對新生產業發展沒有好處，對產業升級的壓力欠逢。

以市場供求定出匯率價格

因此，中國把經濟增長速度稍為放緩，其實對調整產業結構有利。當然，增長也不能「硬著陸」，令失業率大幅上升引起恐慌。所以保持宏觀經濟相對合理的需求擴張，令就業市場穩定但不熾熱的平衡點十分重要，也是中國深化改革前進的立足點。

一方面在過去國際收支帳目中，經常帳及資本帳出現的巨大「雙順差」，是好景的表現方式，缺乏壓力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另一方面，龐大的貿易順差，也帶來人民幣匯率「低估」和「操控」的指控，更成為中外貿易摩擦及爭拗點。

日前，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召開記者會，提到當前中國逐步改進產業結構，減少貿易順差，人民幣匯率離均衡水平已較近，並具備浮動幅度加大的條件。

照目前的發展形勢看，擴大人民幣對外幣每日的波動區間，讓市場的供求關係，更多地去影響匯率的形成，是合理的政策轉變。若波動區間狹窄，人民幣匯價的走向，主要視乎政府在背後的「操盤」方向。政府的主導性固然也會考慮到市場和政策的需求，但擴大匯率波動區間，有利市場自身的力量在波幅內找到相對均衡的價格。

《文明的代價》的啓示

筆者相信經濟一般應該以市場為主，但不能排除政府功能的角色，把市場功能和政府功能合理結合，對中國目前的經濟轉型的驅動十分重要。

最近筆者拜馬壩傑先生饋贈，讀到著名經濟學者 Jeffrey D. Sachs 著作《文明的代價》——《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該書中分析美國社會、政治、與經濟幾十年來如何弄到今天田地。據作者憶述，他唸書時，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強調，現代的經濟是「混合經濟」，當中既有政府功能，也有市場功能，互相補充。Sachs 分析，過去三十年，美國的「政府功能」相繼被一一打破，到最後市場失控了，社會也失控，

包括電視的信息產業被巨賈所控制，為某一個界別或意識形態服務，令公共空間的多元性萎縮，令政治社會與經濟領域為利益集團操控。

中國要發展經濟，必須不斷因應形勢變化，對下一個發展階段的提升，找出樽頸所在，消除樽頸的阻礙。有時問題可能受制於資源包括人力資源，但往往也在於政治經濟制度。因此，保持一個開放的決策過程，有一定民主成份的制度非常重要。在這種制度下，一些不合理現象得以曝光，在陽光下受到人民的監督，不致變成阻礙進步越滾越大的石頭。

換言之，政治上的開明，決策者認真聽取人民的聲音，做到中國古語所謂的「兼聽則明」，並且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看到樽頸所在，認真解決，能夠這樣做，筆者對中國的發展前途充滿信心，不擔心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過去三十年中國政府制訂及執行政策的成績有目共睹，比很多發達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環境承載發展的局限

另一方面，就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無論中國或全球其他國家，都要考慮環境的承載力，是否能夠支撐 GDP 無限增長。若每年以一定的百分比增長，沒有止境，究竟 GDP 增長的意義何在？這些發展需要消耗多少地球的資源，要排出多少廢氣、毒氣及熱力，破壞了人類棲息的环境？

目前，中國整體的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顯然還有一段差距，所以還有繼續增長的空間與需要。但無止境的經濟增長追求，總會超越環境的承載力，因此，可能我們的生活方式及生活目標必須作出調整。改善生活質素的追逐，到最後不一定是更大的物質索求，而是在既定的物質條件下尋求更大的快樂，包括心靈的滿足，令提高生活質素的內涵更多樣化，達至「知足常樂」。

美國經濟規模當今第一，人民物質享受豐厚，但 Jeffrey D. Sachs 的新著就指出，與其他國家的人比較，美國人的物質享受和收入都遠為優勝，但並不比他們開心。

回到當前現實，中國部分發達城市中，一些富起來的人確實不斷購買外國的名牌貨，一擲萬金，有些傻氣。但這種炫耀性的消費能夠持續令他們快樂嗎？同時，在很多地方，很多老百姓依然在尋求生活溫飽的路上徘徊，需要合理改善物質生活的條件，包括住的房子不會輕易倒塌，食物不會也滲入了有毒有害的東西等等。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繼續推進農村危房改造，解決了六千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 60 萬無電地區人口的用電問題，進一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並且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筆者相信，最主要

的政策目的，也是追求經濟轉換發展方式的目標，應該在著眼於改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質素，增加人民的福祉，令人民更加快樂。

〔論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二之一〕